

农产品价格不是通胀元凶

农民有体面 小康才全面

□郑风田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12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2.5%,其中食品价格上涨4.1%。2013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涨2.6%,低于全年3.5%的调控目标。国家统计局前总经济师姚景源表示,2013年物价保持稳定主要得益于农产品价格稳定。

近年来,食品价格一直被认为是CPI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有报道称,在整个CPI构成中食品价格约占1/3的比重。由于我国许多地区的农业生产仍然属于“小农经济”,“靠天吃饭”的生产方式仍未彻底改变,农产品供应极易受到短期自然灾害的影响。加之单户经营的农户难以与大市场进行对接,对市场变化难以进行准确预判,无法及时调整养殖结构。因而农产品供需的波动性较大,导致食品价格往往大起大落,由此带来CPI的波动。

CPI究竟是不是衡量通胀的最佳工具?笔者

看过不少专业研究报告,很多都认为农产品价格变化并不是通胀的元凶,罪魁祸首应是过量的钞票发行,是通货膨胀带动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而不是相反。

其实对于CPI的构成大家一直有看法,目前食品类是三分天下有其一,太大了,这显然是极不合适的。我国近一半的人口在农村,他们家庭消费有一大块是自产,不应计入。在城市,应该只有低收入阶层的食品支出才会占1/3那么大比重,一般家庭应该20%以下。而与此相对应的是,房价、子女教育与社保费用的飙升,应大幅度提高这些因子的比重,降低食品类权重。否则拿一个不合理的CPI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会出大问题。

食品类在CPI所占比重过高,往往也成为粮食价格被过分打压的一个重要理由,长此以往,对生产粮食的农民极为有害。目前我国粮食生产的比较利益太低,农民在家种地一个月的收入还

赶不上外出打工一个星期的收入。近年来农民工工资大幅上涨,更加影响在家务农农民的种粮积极性,部分地区已出现“种懒田”、抛荒等现象。

应该建立联动指数来调控粮价,而不应单纯为了保CPI而去人为压低粮价。国家更应建立一种价格联动指数,即对农资、城市居民工资上涨等建立一种综合价格指数,如果粮食价格没有超过这个联动价格指数,就不应该打压。

当然粮食价格也不能涨得太离谱。为减少粮价上涨带来的负效应,我国可学习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食物券政策,对城市低收入阶层发放免费食物券,让他们不致因食物价格上涨而影响生活。我国吃大锅饭的食物涨价补贴也应该改变,未来可以按照家庭收入来补,只对低收入阶层补。如果对所有家庭都补,其实是对低收入家庭的一种伤害。对于生产粮食的农民,尤其是粮食主产区的农民,则是应加大直补力度,或加大养老补贴。

[分析评论]

多中心治理,实现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

——转型期乡村治理的结构现状、问题与发展趋势

乡村治理指包括政府和乡村社会以及其他组织和个人在内的多个主体,为了实现公共利益,对乡村进行组织、管理和调控的动态过程。乡村治理结构指各治理主体在各自权力、职责范围基础上的行为模式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本文以转型期的乡村治理为研究对象,选取湖南省长株潭、沅江、衡阳三个地区为样本,探讨转型期乡村治理的结构现状、存在问题与发展趋势。

□张桂蓉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乡村治理结构的好坏直接影响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转型期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点:第一,体制性困境,具体表现为乡村事实上形成了“领导—被领导”关系,村委会换届频繁带来一系列问题;第二,财政性困境,具体表现为乡镇负债运行、治理能力弱化;第三,组织性困境,具体表现为村民代表大会流于形式、农民自组织发育不成熟。

转型期乡村治理的发展趋势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实现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第二,建立完善的公共财政体制;第三,探索乡村的多中心治理。

乡村治理结构现状

乡镇政府是“乡政村治”的核心,其主体作用出现弱化趋势。乡镇政府是“乡政村治”的核心。作为主导乡村治理的国家力量,乡镇政府应当对乡村治理的运行和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村民自治制度和全面取消农业税的实施直接冲击了作为基层政权组织的乡镇政权,有些乡镇政府的主体作用正在弱化,使得乡镇政府出现空心化的现象,进而也会影响乡镇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作用。

村党支部在乡村治理中作用最大,村委会的作用得到村民一致认同,但村民代表大会流于形式。村党支部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无论是从村民来看还是从县乡干部来看,都认为村党支部起到的作用最大。大部分村的村支书和村主任是由两人分别担任的,受访者对村委会和村党支部的关系持乐观态度。县乡干部强调要加强村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村民代表会议是村民行使表达权、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的组织形式。但是根据笔者的调查,虽然成立了村民代表大会,但是具体事务还是由村“两委”决定,村民代表大会形同虚设。

乡村治理的非正式主体作用微弱。从调查的情况看,宗族不再直接参与乡村治理,而是作为影

响者而存在,其作用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而宗教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很小。无论是从村民角度来看还是从县乡干部角度来看,宗教并非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虽然笔者发现,在调查区域中,宗教是普遍存在的,但是主要表现为一种个人信仰,并不带有政治含义,在乡村治理中也没有多大作用。乡村中的企业发展缓慢,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也不明显。但是笔者调查也发现,大部分村干部都经营有自己的企业或事业,甚至有人将村干部称为“副业”。农民自组织的发育仍然不完全,发挥的主体作用较小,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意识和能力都有待提高。

转型期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体制性困境 “乡政村治”的时代虽然开启,但是传统的“压力型体制”仍然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乡村治理。乡镇干部习惯于把乡镇政府看作是乡村治理的第一主体,把村委会看作自己的下属行政机构,习惯于采用行政命令的方式,特别当国家给乡镇政府下达硬性任务的时候。同时现行的《村委会组织法》规定:村委会每届任期三年。受访县乡干部认为,三年一换太频繁,给乡村治理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主要表现在村委会不敢做事和乡镇财政负担加重两个方面。

财政性困境 笔者通过调查发现,乡村治理的财政性困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负债运行导致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税费改革后基层治理能力弱化。实行“分税制”以后,较为稳定和较好的税收都被上收,许多乡镇政府在新一轮一轮地投资乡镇企业失败和连年承担义务教育投入的压力下,陷入沉重的债务危机之中。在调查中,也有人戏称乡镇财政不是“吃饭财政”,而是“讨饭财政”。同时,在税费改革和全面取消农业税后,乡镇经济调节能力减弱,对农业生产不得不放任自流,农业经济风险增加;乡镇社会管理能力下降,公共物品供给不足。

组织性困境 组织性困境主要是从农民组织的发育和运行视角分析的。首先,村民代表大会流于形式而失去其监督作用。村民代表大会是村民行使表达权、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的组织形式,



但是,在具体的乡村治理实践中,村民代表大会流于形式为村“两委”和村干部独断专行提供了可能。其次农民自组织类型单一,数量少,作用微弱。我国农民自组织的类型大致包括: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农民维权组织和社区服务组织。农民自组织的成长和发育有助于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有助于乡村善治的实现。笔者的调查结果显示,农民自组织的类型单一,数量少,仍然较为匮乏,缺乏参与乡村治理的能力和机制。

转型期乡村治理的发展趋势

实现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 对乡镇政府而言,要实现从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转变,首先要彻底转变官本位的观念,牢固树立村民本位的观念。其次要树立村民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摒弃小团体理念。再次要转变职能,加强与村委会的沟通与协作,改变那种将村委会视为乡镇政府下属的观念。第四,切实严格依法行政,保证村民的权利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障。

建立完善的公共财政体制 建立完善的公共财政体制成为乡村治理的大势所趋。首先,要建立民主、透明的乡镇财政预算、决算机制。乡镇财政应全面实行部门预算,细化编制预算,做好严格的决算。其次,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确保权、责、财统一。中央以及各级地方政府都应在预算中制定详细的财政转移支付计划,并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保证乡镇政府权、责、财相统一。再次,建立化解乡村债务与预防新增债务的机制。最后,充分发挥乡人大和村委会的功能,监督公共财政的使用。

探索乡村的多中心治理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传统的单一主体格局已经无法解决乡村治理的危机。探索乡村的多中心治理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笔者认为,乡村多中心治理应当包含以下内容:第一,村“两委”是乡村治理的核心力量。第二,村民是乡村治理的骨干力量。第三,乡镇政府是乡村治理的引导者。第四,市场是乡村治理的重要推动力量。第五,民间组织是乡村治理的重要保障。

北方冬季为什么需要“地产菜”?

□王瑜 对不少北方城市来说,冬季菜价和气温往往成反比,气温一下降,菜价就容易“烧”起来。菜价不稳,源自供应波动;而供应波动,往往可以追溯到千里之外。

随着“大市场、大流通”市场格局的形成,“南菜北运”为北方冬季餐桌增添了更多绿色,但对南方的依赖也提高了北方蔬菜流通的风险系数。首先,长距离运输增加了蔬菜流通成本。从海南三亚到黑龙江哈尔滨长达3500公里,每公斤蔬菜仅运输成本就高达1.8元,而且每一次汽柴油涨价都考验着消费者的承受力。其次,高耗损率

提高了蔬菜损耗成本。蔬菜含水量高易腐烂,加之我国蔬菜产地大多没有预冷设施,冷藏运输车也很少,蔬菜在长距离运输过程中损耗率高达20%~30%,这部分损失将直接体现在菜价中。再次,突发性极端天气增加了供应的不稳定性。上述三个因素决定了北方城市冬季“菜篮子”要拎得稳,必须保证一定的自给率。

当前,我国北方不少城市冬春淡季地产鲜菜占比仍然较低,其中甘肃兰州、山西太原只有20%左右,纬度更高的黑龙江哈尔滨则不足5%,在这种情况下,呼吁北方城市为冬季储备一些

“地产菜”,当不是杞人忧天。问题在于,在城镇化、工业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城郊菜地减少的趋势难以逆转;在日光温室性能不断提升的背后,是建设成本一年年的增加;随着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一亩园十亩田”的比较优势很容易被“一日工一亩田”比下去……保供和求发展,二者能否齐头并进?在沈阳菜农李茂凤的故事中,我们看到农民对“扣棚”的积极性不减;在西安高陵县何村,我们看到了政府和市场如何各归其位“共炒一盘菜”;在武威菜农王秀兰的转变中,我们看到了金融瓶颈也可以变成发展助推力。沈阳、西安和武威的探索表明,北方城市有能力让市民在冬季吃菜更安心,而这也是发展北方城市冬季设施蔬菜的目的所在。

“三农”发展是爬坡,让农民过上体面的、有尊严的幸福生活是过坎。过坎和爬坡都是力气活儿,都得咬紧牙关、奋力登攀。让农民过上体面的生活,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根本上还是靠深化改革激发农村发展活力,推动转型增添农业进步动力,帮助农民增强致富能力,促进城乡一体化提升农村魅力。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拉长农业的短腿,补足农村的短板,成就农民的体面,希望的田野上就会不断生长梦想、收获幸福。